

論《大易》與《春秋》的關係

林義正*

一、前言

近年來國內學界因應西方詮釋學（hermeneutics）的流行，也開始反省中華學術中的解經傳統¹，甚至企圖模擬創立所謂的「儒家詮釋學」、「中國解釋學」²。筆者在閱讀過有關研究中華學術的解經傳統諸論文後，感覺到學者們似乎只專注個別經典在歷代解釋的變化及其解釋的方法，若據此而建立所謂某一詮釋學的話，恐怕會有所疏漏；因為依照西方傳統詮釋一經的理論實在不足以涵蓋中華傳統詮釋多經的經驗。蓋中華傳統經典詮釋本有眾多專守一經的儒者，亦有不乏通儒者，其所採取的正是以會通群經為究竟。今以古今通儒對《大易》與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¹ 以臺灣大學出版的刊物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五十三期（2000.11）所刊八篇論文中就有四篇與中國經典註釋傳統有關；《臺大歷史學報》第二十八期（2001.12）就以「東亞文化與思想：文本、詮釋與行動」為主題。

² 參見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儒家詮釋學芻議〉，《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五十三期，頁69-94；湯一介曾撰〈能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學人》第13期，1998.3），以後多次論及中國解釋學問題，又有〈關於建立《周易》解釋學問題的探討〉（《周易研究》第42期，1999年第4期）、〈再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三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關於僧肇注《道德經》問題——四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學術月刊》2000年第7期）、〈論郭象註釋《莊子》的方法——兼論創建中國解釋學的問題〉（《道家與道教·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9，道家卷，頁303-4）、〈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8期，2001.6，頁7-23）。〈「道始於情」的哲學詮釋——五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學術月刊》2000年第7期，頁40-44）。

《春秋》關係之考察為例，指出究竟此二經有沒有關係？若有關係，究竟有何種關係？為什麼有如此關係？據此，可以看出中華經典詮釋的複雜性，或有助於中華經典詮釋學的建立。

二、釐清《大易》與《春秋》之所指

在考察《大易》與《春秋》關係的時候，有必要對《大易》與《春秋》之所指作一番辨明。

傳統言《易》，依《周禮·春官·大卜》所言：「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有謂「易」乃「覲」之借字，為筮官，掌筮卜，故其書亦謂之《易》³，可見《易》有三《易》，惟今天所傳者僅《周易》。據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周易》，其卦序與今本不同，但經文（卦辭、爻辭）大體一致，可視為同一材料的不同編本。就經文而言，當今學者大體上認為《周易》卦爻辭是殷周之際的作品，是一本占筮書。但1997年有一新說，認為文王不曾重《易》，亦不曾作卦爻辭，文王演《周易》是指韓宣子在魯所見的《易象》，亦即藏諸秘府之《周易》，此與民間流行之方術《周易》無關，但與今本《周易·大象》有關。今本之〈大象〉結構由卦畫、卦象、卦名、卦義所構成，本身即具有一完整意義的《周易》，只用於「演德」，不用於「筮占」，此正是孔子學《易》之途徑⁴。可是這一假說設定《易象》之《易》與《周易》之《易》為不相容之兩物，此未必事實。蓋《易象》所取之「象」本可借占《周易》之「象」，以言成德之教⁵。今之《周易》即筮即教，恐太史氏所傳《易象》即如此。孔子晚年承此《易象》法象修德之途徑，加上春秋時代以來以義理解《周易》之傳統，對《周易》進行綜合解說，經弟子傳承，構成後來所謂的《易傳》（十翼），於是《周易》由筮書一變而成為孔子晚年言「性與天道」的哲學巨著。漢人尊孔，視之為經，則已不純是一本筮書，而是人文教化中的六藝之一，或稱五經之原。後人稱為《易》、《易經》或《大易》所指的正是孔子借此筮書作創造詮釋，形成筮表理裏的典籍；至於歷代對《周易》，如果是本孔子義理立場所作的傳，亦屬孔門之《易》學，那些本著筮數或道家玄理的解說，雖有理境，恐不能與孔子《春秋》義相提並論；故考論《大易》與《春秋》的「關係」，必不得不區分孔子以前之《周易》與經

³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北京：中華，1984.3）卷首頁5-6；屈萬里，《讀易三種》（台北：聯經，1983），頁1；參見黃沛榮〈先秦筮書考〉（《書目季刊》第17卷3期），頁80。

⁴ 姜廣輝，〈文王演《周易》新說〉（《哲學研究》1997年第三期），頁64-75。

⁵ 參見拙文，〈論《列子·天瑞》的易道思想〉，臺大《哲學論評》第23期（2000.1），頁27。

孔子「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而成之《易經》或云《大易》。

至於《春秋》也一樣，應該區分孔子所修或作的《春秋》與非孔子所修或作之《春秋》。因為孔子之時或前或後，本有《春秋》之名，汎指諸國之史記，如《墨子·明鬼》所說：「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百國《春秋》；魯亦有史記，名為魯《春秋》，在《公羊傳·莊公七年》稱之為「不修《春秋》」，此《春秋》乃魯史之專稱⁶，《左傳·昭公二年春》韓宣子聘魯於大史氏所見之魯《春秋》是也。故於先秦稱《春秋》時，宜慎加檢別，然通稱之《春秋》，載各國之史，記成敗之跡，《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謂《春秋》乃先王經世之誌，〈天下〉篇謂「《春秋》以道名分」，蓋本史官秉筆直書，捍衛名分，褒貶善惡之意。孔子修作《春秋》，對魯《春秋》不完全苟同，因別有寓意，故筆則筆，削則削。漢人尊孔，以孔子所修作之《春秋》為經，然所傳有別，後世專注於史事者，有《左氏春秋》，專注於義例者，僅存《公羊春秋》與《穀梁春秋》。所以，對孔子之《春秋》，其內容可本諸左氏之《春秋》義，亦可本諸公穀之《春秋》義，若進而細分，則有微言大義兼傳之公羊《春秋》義與僅傳大義之穀梁《春秋》義。後世於「三傳誰得孔子《春秋》義之全與真？」本有諸多爭論，然若本諸《孟子·離婁》所言：「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可見孔子之《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均於魯《春秋》之事、文、義頗有所去取，斷自魯隱公元年春，至魯哀公十四年春止，記二百四十二年史事，然而其目的卻在義而不在事。《公羊傳》有「託始」之口訣，明《春秋》為借事明義之作，如同《大易》有假象，是借筮《易》明理之書，同一比例；熊十力先生曾指出「二經制作極特別，皆義在言外。《易》假象以表意……《春秋》假事以明義……」⁷蓋道破二經詮釋的關鍵。後世之言《春秋》者，均不外二類：一者古代史官傳統，即有秉筆直書而善惡自現的信念，與孔子之作《春秋》有別，左氏雖名從孔子《春秋》，但實是治史之流；另者是迎孔子撥亂反正之志，即筆削以見大義，探索王之法，為公穀所信持；孔子之《春秋》於史官所傳之義當有所承，但別有所寓，此劉知幾「惑經」所在，其惑在不知孔子之《春秋》實孔子晚年呈志之書，竟依史例責之，其惑固宜。

⁶ 劉百閔，《經學通論》（陽明山：國防研究院，1970.3），頁304。

⁷ 熊十力，《讀經要義》（台北：廣文，1967.11再版）卷三，頁142。

三、《大易》《春秋》在六藝中所扮演的功能

在考察《大易》與《春秋》關係的時候，也有必要對《大易》《春秋》在六藝中所扮演的功能作出了解。《大易》《春秋》所扮演的功能如何？實與孔子贊與修之前後有不同的表現。在孔子之前，它是從記錄先王德業之所以成就的功能來說的，並由此而成為後人德教的內容。依現有史料來看，有以下兩則：

1.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春》）
2. 《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舍之衣，此使君不迷之數也。（《管子·山權數第七十五》）

從這兩則，看出《春秋》在魯國與齊國的史學功能，而《易》在魯則重在取象修德，在齊則重在守吉凶成敗之用，顯然這是自西周以來對《易》與《春秋》的傳統看法。孔子早年以《詩》《書》《禮》《樂》教弟子，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8.8），此與《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意相同。及至孔子晚年對《易》的看法有所改變，以為有「古之遺言」⁸在焉，不純以筮書視之，故亦採《易》以為教；對魯《春秋》亦當有所講述，即《論語》所記論齊桓晉文事（14.15），可見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必有其事。1993年10月郭店楚墓竹簡出土，其中儒簡〈六德〉，有稱觀諸《詩》、《書》、《禮》、《樂》、《易》、《春秋》者，所觀即「六經」⁹。孔子以此教弟子，欲其得修己治人之道。六經之於人各有不同的作用：

⁸ 廖名春，〈帛書《要》釋文〉（見《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1995年1月，頁28。

⁹ 見《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可見老子與孔子所言之「六經」蓋指記先王陳跡之六部古籍也，與漢以後視經為永恆之常道義不同。1993年10月郭店楚墓竹簡出土，於1998年5月公布釋文，據學者考訂，此墓葬於孟子在世時，故其竹簡之文當流傳於300B.C.以前，其中有儒簡〈六德〉有「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又〈語叢一〉有殘文「《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知孟子以前已有六經之教也。

1.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禮記·經解》）
2.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天下》）
3.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矣。（《荀子·儒效篇》）

由以上第一則，得知孔子認為為政者是用六經來教化國人，涵養民德；所以從國人為人的表現上，便可以判斷是受到何種經典的教化。從《莊》《荀》所言之經教作用，得知《詩》《書》《禮》《樂》所指竟完全相同，唯其餘兩者有異，《莊》言《易》《春秋》，乃尊史傳舊義；《荀》述孔聖微言，以《春秋》為天下之道、百王之道。此六經之名始於《莊子·天運》中老子與孔子對話之用語，顯然此「經」指載先王陳跡之古籍，非必有如漢代今文家所謂孔聖之作，垂訓常道之意。觀漢代將《詩》《書》《禮》《樂》《易》《春秋》當作六藝或六經¹⁰，因《樂》已失，故稱五經。兩漢尊孔，將孔子所傳之六藝稱作六經，則六經之名雖同，則含意已變，此不可不知。

及至漢代陸賈《新語·道基》詮六藝以仁義¹¹，賈誼《新書·道德》詮六藝以德理¹²，

¹⁰ 《漢書·匡衡傳》卷八十一，列傳第五十一：成帝即位，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人天之理可得而知，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又《漢書·翼奉傳》卷七十五，列傳第四十五：「奉奏封事曰：天地設位，…以示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以示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

¹¹ 陸賈《新語·道基》云：「〈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名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義）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¹² 賈誼《新書·道德》云：「《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按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為之

劉安《淮南子·泰族》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對六藝之教之得與失亦如《禮記·經解》之說：

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忤，《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

他說六藝貴在「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兼用而和成其美，不知裁制流於失。可見六藝均為道的用。至於其他言及六藝（六經）或五經之要旨尚有：

1.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故簡六藝以瞻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以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陰陽，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春秋繁露·玉杯》）
2. 吾聞之董生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
3.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史記·滑稽列傳》卷126）
4.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法言·寡見篇》）
5.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

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脩，則合於德矣。合則謹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樂者也。」

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漢書·藝文志第十》）

為了便於總結先秦兩漢對六經旨要的說明，作圖如下：

六經 出處		《詩》	《書》	《禮》	《樂》	《易》	《春秋》
1	《禮記》	溫柔敦厚 其失愚	疏通知遠 其失誣	恭儉莊敬 其失煩	廣博易良 其失奢	絜靜精微 其失賊	屬辭比事 其失亂
2	《莊子》	道志	道事	道行	道和	道陰陽	道名分
3	《荀子》	志	事	行	和		微
4	《淮南子》	溫惠柔良 其失愚	淳龐敦厚 其失拘	恭儉尊讓 其失伎	寬裕簡易 其失淫	清明條達 其失鬼	刺幾辯義 其失訾
5	《繁露》	志 長於質	著功 長於事	制節 長於文	詠德 長於風	天地陰陽 長於數	正是非 長於治人
6	《史記》	達意 長於風	道事 長於政	節人 長於行	發和 長於和	神化 長於變	道義 長於治人 辨是非 撥亂世 反之正
7	《法言》	說志	說事	說體		說天	說理
8	《漢書》	正言	廣聽	明體	和神	為之原	斷事
總結經義		溫柔達意	說事著功	行為節制	詠德和神	天道變化	辨正是非

從以上六經或云六藝之經義重點而論，吾人實不易發現各經之間有何必然的關係，更何況是《易》與《春秋》呢？它們只統作孔子教學的內容，目的在培養士、君子的人文素養而已。誠如孔子所言：「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16.13）能通六藝始成王道之才。《史記·孔子世家》所述：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一年自衛返魯後）

依司馬遷所述，孔子之序《書》傳、刪《詩》、訂《禮》、正《樂》、贊《易》（即所謂「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作《春秋》，正是「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將六藝當成推行王道的教科書，這就是將史書意含的先王古籍，轉化成積極經世的思想著作。《詩》《書》《禮》《樂》內容經過刪訂改編，或有寓意其間，但內容不外史料；但是經贊《易》後的《大易》，是借筮文以詮天人之理的著作，與經刪削魯《春秋》過後的《春秋》，已非魯史，而是撥亂反正的經世書了，這兩本書成為孔子晚年思想的巨著。《春秋》經孟子闡發，其「義」尚為後人所關注，唯獨《大易》之微言為筮卜之書所湮，致不甚了然；所以兩書的關係更加渺茫難尋。《史記·太史公自序》謂：「先人有言：自周公卒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為什麼其父如此鄭重地寄託他要「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這表明他作史是要本六藝，宗孔子，準《易傳》，繼《春秋》，成百王大法、論治之書。¹³因太史公心目中的《春秋》是孔子明志、傳道、立法之書，似史而實為經¹⁴，而以之為法的《易傳》也絕不是筮卜之書可知，《易傳》與《春秋》連言，必隱含相關之意。

四、《大易》與《春秋》的關係史

若說《大易》與《春秋》有關係，那就是從太史公在〈司馬相如列傳贊〉中開始透露出來的：

¹³ 阮芝生，〈滑稽與六藝——《史記·滑稽列傳》析論〉，《臺大歷史學報》第20期（1996.11），頁355、357。太史公為何說要「正《易傳》」呢？其「正」字何意？今人多所推測。然筆者依漢人的了解，《易大傳》乃孔子作，而《易大傳》正是闡明性與天道、古今通變之義。太史公所著《太史公書》正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此乃律襲孔子《易大傳》之意，故「正」字宜作「準」解，不宜作「校正」解。

¹⁴ 阮芝生，〈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臺大歷史學報》第23期（1999.6），頁1。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

太史公對孔子思想的認識的確非凡，他指出了《易》與《春秋》的關係。在今天捨離〈孔子世家〉來談孔子，皆不見孔子晚年的實況；這在 1973 年《帛書易傳》出土之後，更印證了司馬遷的說法並非無據。因此，筆者認為漢代經今古文學之爭，基本上是對孔子之學不同的理解¹⁵。古文家以孔子是史學家，只述不作，雖亦尊經，但其經義如同史義，此即後來「六經皆史」說的根源，因視六經為古史，則各經之間談不上有何內在深層的關係，只能順承古史，渾說同道而已。但於今文家則不然，其必視六經皆孔子作，雖有過度誇大之嫌，然因對《易》與《春秋》有不同解讀，勢必產生一番新的領會。從孔子對古史（古六藝）之刪述贊修以來，成為新六藝，此今文家心目中的六經也，依此看，六經成為表達孔子晚年整個思想體系的作品，如此更促成《易》與《春秋》關係的緊密度，此非古文家所能知也。然自漢鄭康成出，合今古文而為一，陽宗今文，陰扶古文，而孔子說經之家法始亂；又自六朝之南派出，變本加厲，專尚古文，加於鄭氏之上，而舊史說經之言，始獨行於世，於是孔子手定之六藝已遭變亂矣。¹⁶《易》於《漢書·藝文志》所載：「《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按三家屬今文學，其受自周王孫，周王孫受自丁寬，丁寬受自孔子六傳至漢之田何；其初無章句，自周王孫始有《易》傳、《易》說，但舉訓故大義，不言陰陽災變，後有焦延壽、京房、高相者言災異；另有費直傳古文《易》，其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¹⁷故《易》雖分今古二派，但傳承文本即《漢書·藝文志》所載十二篇之《易經》並無有別。《易》之卦爻辭乃《周易》古經，本為筮書，秦不焚，幸得以傳，然孔子之《易》貴在借筮明理之傳。《易·繫辭上傳》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第十章）故不礙借占卜、災變、災異等象數以廣《易》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謂：「太史公（司馬談）受《易》於楊何。」而楊何實受自王同，王同受自田何，故司馬遷之言《易》出自家學，所傳之《易》義（本隱之顯）與《春秋》義（推見至隱）合為一德，其必孔子晚年之天人之學也。

¹⁵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台北：臺灣商務，1967.3 臺一版），頁 9-13。

¹⁶ 張爾田，《史微》（台北：華世，1975.4），頁 39。

¹⁷ 劉百閔，《經學通論》（陽明山：國防研究院，1970.3），頁 336-337。參見唐晏，《兩漢三國學案》（台北：仰哲，1987.11），頁 4-6、47。

自後漢乃至五代，儒學浸微，孔子成六藝，備王道之義已支離矣，更何論《易》與《春秋》相合德之旨乎？然儒學之運終不息寂，北宋諸儒大有功也。然能體孔子作《易》與《春秋》之心者，其孫明復（992-1057）乎！孫明復曾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其弟子石徂徠（1005-1045）曰：「先生嘗以為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¹⁸孫明復指出二經乃心——用之關係，極明快，實太史公以來之第一人。北宋理學家邵康節（1011-1077）、周濂溪（1017-1073）、張橫渠（1020-1077）均深於《易》，二程曾受《易》於周濂溪；周濂溪作《易通》，一名《通書》，其言《易》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精蘊第三十〉）言《春秋》則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孔子上〉第三十八）確不失兩漢今文家法，惟兩經關係已蘊其中，隱而未發。程伊川（1033-1107）曾著《易傳》與《春秋傳》，至晚年尚不輕易示人，曾應門人之問，而曰：「《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¹⁹伊川所說聖人實指孔子，其於二經關係的說明，實亦承孫明復之說，而更譬以律——斷案、藥方——治法。胡宏（1105-1161）謂：「《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易》載其理，《春秋》見其用。」²⁰「知《易》，知《春秋》，然後知經綸之業。」²⁰這樣的看法均本諸理學家的體察，其言：「為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者，天下之大用也。」可見他認為孔子之道有體——用，或有理——義，而二經正具有如此的關係。

及至南宋，朱熹（1130-1200）於《易》不滿意於程傳棄象數而專明義理，作《易本義》；平生於《春秋》不甚措意，以為「《春秋》煞有不可曉處。」²¹曾對學生說：「《易》與《春秋》難看，非學者所當先。」基本上朱熹對《易》與《春秋》均本學術史的立場，對三傳，甚至先哲的傳著是否得聖人真意都有所保留。曾說：「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至於二書的關係，他說：「《漢書》：『《易》

¹⁸ 石介，〈泰山書院記〉，《徂徠集》卷19頁7，（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29別集）；亦見《宋元學案》（台北：河洛，1975.3臺灣景印）上冊，卷二，泰山學案，頁95引文。

¹⁹ 見《二程集》（台北：里仁，1983.3），頁349，401，582，583。

²⁰ 見胡宏，《知言》（北京：中華，1987.6），頁44，144，40，29。

²¹ 引文依序見《朱子語類》（台北：文津，1986.12），頁2144，1660，1661，1659。

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他的看法比較複雜，沒有像孫明復、程伊川、胡宏那樣明確說是孔子思想中的體用關係或理義關係，只是模糊地順著司馬遷的說法。

元代黃楚望（1260-1346）一生困頓，然專攻《易》象與《春秋》，其學至老一向不輕易示人。對自唐以來的《春秋》學多所不滿，曾說：「《春秋》、《周易》二書，大旨皆失傳²²。」「《周易》《春秋》是有繩墨規矩之文，不比他經；學二經者，若知有繩墨規矩，則始可學。此二經者，若能探其旨，知其繩墨，識其規矩，則雖不下注腳而經旨亦明。」「《易》與《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經事體又自不同，《易》則文王、周公，已有全書，《春秋》卻是古所未有。二帝傳授精一執中心法，百聖所同。唯《春秋》一經乃是夫子所獨。蓋夫子之精微縉奧皆具於《易》，而所以立教則在《詩》、《書》、《禮》、《樂》，其撥亂反正，制事之權皆在《春秋》。二帝二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則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豈不信乎？」可見他認定二經皆孔子作，《易》表「精微縉奧」之心法，《春秋》表「撥亂反正」之權制，可謂精審。

明代王陽明（1472-1529）繼陸象山（1139-1193）反朱子之學，別立致良知之教，以吾心為宗，將六經視為吾心之記籍，反對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他說：「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²³因此，《易》與《春秋》完全具於吾心中，乃吾心之常道，其詮釋六經極為獨特，無特別表明二者之間有何關係。

清初，方以智（1611-1671）承家學，通象數，融三教，會西學，著《東西均》，頗有建構哲學後設學之勢。其論六經之關係，曰：「知倫物切于《春秋》，《春秋》養于《禮》《樂》，《禮》《樂》載于《詩》《書》，而《易》以統之，即以泯之。故曰：「《易》襲《春秋》，《春秋》律《易》。」²⁴他以「《易》則天人、性命之消息也，《春秋》則公是非之權也²⁵。」

²² 所引序依《通志堂經解》第26冊，趙汸編，《春秋師說》卷中頁56，卷下頁7；《春秋指要》卷下頁23。參見簡福興，《黃澤春秋學方法論》，《孔孟學報》第78期（2000.9），頁33-34。

²³ 俱見〈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王陽明全書》（台北：正中，1955.12 臺三版）第一冊，頁214-215。

²⁴ 《易餘·薪火》，見羅域，《方以智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1.2），頁131所引。

²⁵ 以下引文，依序見方以智著、龐樸注《東西均注釋》（北京：中華，2001.3），頁173，97，98，102，

其間有所謂「襲律」者，即取法之義，故二經互取。再者又以「襲」指人事，「律」指天道，用一「準」字，表「《易》以襲準律，《春秋》以律準襲」說明各經內部中含天道與人事之互準。「《春秋》準《易》」其義等於「《春秋》之權以《易》為則」，這只說一邊，其實應含二邊。另外又說：「以《易》主《春秋》，《春秋》宰《易》」，而六經之用皆禮也。禮也，體也，理也，弄丸之，一也。」則二者又互為主宰；不管如何說，依其「《易》《春秋》，陰陽之合符也」一句，當可推知二經蓋一體圓融而互準、互宰、互取也。

與方以智同時的王夫之（1619-1692）亦精通六經，以常變之教統攝之。其謂：「聖人之教，有常有變。《禮》《樂》道其常也，有善而無惡，矩度中和而側成不易，而一準於《書》。《書》者，《禮》《樂》之宗也。《詩》《書》兼其變者，《詩》之正變，《春秋》之是非，善不善俱存，而一準《易》。《易》者，正變、是非之宗也。……天下之情，萬變而無非實者，《詩》《書》志之。天下之理，萬變而無非實者，《易》志之。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是以君子格物而達變，而後可以擇善而執中。貞夫一者，所以異於執一也。」²⁶所說二經是言理——見事的關係，而《春秋》見事之非以《易》理之正變為宗準，是單向的理事、體用關係，而非方以智所示相互體用關係。

胡煦（1655-1736）精通《周易》，著《周易函書》，其稱《周易》是聖人傳道、言性、窮理格物、博文約禮、天人合一之書（〈易解辨異〉），曾用「須知」的口吻說：「聖人之道盡在《易》象、《春秋》，《易》象其大本也，《春秋》其大用也，舍此，則學聖者無本領，亦無作用。」²⁷「《周易》言天人合一之旨，故為聖人之大本。《春秋》具天人感應之機，故為聖人之大用。試觀其中，或天變而人從之，或人感而天應之，不是無因，特標此天時天象也；不向天人交關處著眼，則止是魯國之史耳，何云聖經？」「《周易》微顯察來，便是追溯天人之所以然處；而《春秋》謹始慎微，便是求端於事功之所由起時。」又說：「《春秋》全是《易》中道理。」顯然，將孔子的天人之道盡於此二經，一表大本，一示大用，這是以本——用來說明二經的關係。

章學誠（1738-1801）唱六經皆史說，以為「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²⁸他提出了讀經以知類為首要，頗有啟發性，如說《易》之象通於《詩》之

146，97。

²⁶ 王夫之，《周易外傳·說卦傳卷七》，《船山全集》第2冊（台中：大源文化服務社，1965.9），頁1079。

²⁷ 以下所引，俱見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九集中，胡煦，《周易函書約存》第十二冊，卷三頁5-6。

²⁸ 章學誠，《文史通義》（台北：史學，1974.4 重印四版），頁1，5-7。

比興，《易》之辭通於《春秋》之例。他說：「《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這仍不出司馬遷、朱熹之見。

清代今文學之冠冕劉逢祿（1776-1829）本《春秋》以通五經，而其《春秋》義則以公羊科旨為出發點。他以「聖人之道備乎五經」「不明《春秋》，不可與言五經，《春秋》者五經之筭鑰也，……《春秋》之義固上貫二帝三王，而下治萬世者也。……夫文王道未洽于天下，而繫《易》以見憂患萬世之心，《春秋》象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明《春秋》而後可與言《易》。《易》觀會通以行典禮，而示人以易，《春秋》通三代之典禮，而示人以權。經世之志，非二聖其孰能明之？」²⁹這是在說明解讀五經的門徑，雖指出二經有示人以易——權的不同，然其目的卻不在說明二經的關係。與劉逢祿同受春秋學於莊存與（1719-1788）的宋翔鳳（1776-1860）也同樣關心如何解經，甚至解子的問題，他說：「《春秋》之五始與《易》之四德同例。《易》有四德，則六十四卦，發揮旁通之情見，《春秋》有五始，則二百四十年褒善貶惡之義明，不可以尋常之文，習其讀也。」³⁰至於二經的關係，他表明「《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成天道，故推見至隱。」³¹這是對司馬遷所隱括之名言作了注解，特別說明二經是「性與天道」之書，只差沒有明白說出「其合德一也」。

清末廖平（1852-1932）著《今古學考》，判分今古學宗旨；著《知聖篇》，推闡今文學之浪。他認為六經皆孔子之書，六經之道以《春秋》為初功，以《易》為歸宿。此二書之關係尤為密切。他說：「《易》明變化消長，為天道；與《春秋》全反。一天道，一人事；一循守舊職，一運用無方；一常一變；一內一外。知《春秋》而不知《易》，則拘於成法，無應變之妙。蓋《易》專以『通變』『不倦』為宗旨，故欲知《易》必先學《春秋》，既學《春秋》，不可不知《易》。既能窮《易》之精微，則內外交修，於治術方無礙。盡人事以通天道，《易》所以總學之成，而不沾沾名物理數之形跡。二者相反相成，《易》不立教，以其與《春秋》同也。」³²他把《易》與《春秋》的性質說成相成固不錯，但因此就把二經切成相反：一表天道、外、變與一表人事、內、常，與司馬遷之言相比，就顯得失諸過簡。

康有為（1858-1927）為時政言變法，立於孔子託古改制之說，以《易》與《春秋》為晚

²⁹ 所引，依序見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皇清經解》重編本卷1280，第13冊，頁9425下，9431上。

³⁰ 宋翔鳳，《過庭錄》卷四，見重編本《皇清經解續篇》第20冊，頁16058。

³¹ 宋翔鳳，《論語說義》，見重編本《皇清經解續篇》第17冊，頁13173。

³² 廖平，《知聖篇》卷上，見《廖平學術論著選集》（一）（成都：巴蜀書社，1989），頁187。

年之作，特尊《春秋》張三世之微言。其言二經之旨與關係頗可觀，謂：「昔孔子之作《六經》，終於《易》、《春秋》。《春秋》發明改制，《易》取其變異，天人之道備矣。」³³「《易》言義理，《春秋》言制度。」³⁴「孔子經世之學，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義，著於《公》《穀》。……惟《易》明窮變通久之理，求孔子經世之學，亦以《易》為歸焉。」³⁵依康有為之說，《易》乃孔子天道之學，言窮變通久之理；《春秋》是孔子人道之學，言經世改制之義，而《春秋》之改制以《易》之通變為歸，是以人道合乎天道也。此專注於變，言二經之合德，不違太史公之意。

民國以來，慕西學，棄經學已成定勢，然視經學為民族精神之體者，則不輕言放棄，於六經深造自得者亦頗不乏人。今就曾提及《易》《春秋》二經之關係者，首述受康梁影響的呂思勉（1884-1957）先生，是當代著名史學家，其經學則秉今文家法，曾提出：「《易》與《春秋》相表裡。蓋孔門治天下之道，其原理在《易》，其辦法則在《春秋》也。」³⁶之精語，如孫明復，簡明直截，然為何如此，尚欠說明。

另有創辦復性書院的馬一浮（1883-1967）先生，精通宋明儒學，發六藝統攝一心之論。他認為《易》與《春秋》者聖人末後之教，聖人之全體大用。「天下之道，統於六藝而已。六藝之教，終於《易》而已。學《易》之要，觀象而已。觀象之要，求之《十翼》。」³⁷「《春秋》之大用在於夷狄進退、文質損益、刑德貴賤、經權予奪，而其要則正名而已矣。」視公羊三科九旨為經生之見，有別於清·劉逢祿、宋翔鳳、康有為之說。其以一心統攝六藝，頗類陽明。基於此說，二經關係密切。他說：「學者須知六藝本是吾人性分內所具的事，不是聖人旋安排出來，吾人性量本來廣大，性德本來具足，故六藝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無道也。…此理自然流出諸德，故亦名為天德，見諸行事則為王道。六藝者即此天德、王道之所表顯，故一切道術皆統攝於六藝，而六藝實統攝於一心，即是一心之全體大用也。《易》本隱以之顯，即是從體起用，《春秋》推見至隱，即是攝用歸體，故《易》是全體，

³³ 見康有為在 1895 年赴京會試作〈朝考卷〉。

³⁴ 黎祖健恭錄，蔣貴麟校訂，《南海康先生口說》上卷（台北：台灣商務：1987.10 初版），頁 117。

³⁵ 樓宇烈整理，〈長興學記〉，《康有為學術著作選》（北京：中華書局，1988.8），頁 18。

³⁶ 呂思勉，《經子解題》（台北：河洛，1980.8 台影印初版），頁 72。又呂先生亦在《蒿廬論叢稿》中《呂思勉遺文集上·西漢哲學思想》頁 119 云：「儒家之哲學思想言原理者蓋在于《易》，其引而致之于人事者，則在《春秋》是也。《易》之大義，今日已無具體之書可考，《春秋》之大義，則見于《繁露》者最多也。」

³⁷ 所引，依序見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馬一浮卷》（石家莊：河北教育，1996.8），頁 373，173，17-19。

《春秋》是大用。……須知《易》言神化，即禮樂之所從出，《春秋》明人事，即性道之所流行，……故《易》統禮樂，《春秋》該詩書。以一德言之，皆歸於仁；以二德言之，詩樂為陽、是仁，書禮為陰、是知，亦是義；以三德言之，《易》是聖人之大仁，《詩》《書》《禮》《樂》並是聖人之大智，而《春秋》則是聖人之大勇；以四德言之，《詩》《書》《禮》《樂》即是仁義禮智；以五德言之，《易》明天道，《春秋》明人事，皆信也，皆實理也；以六德言之，《詩》主仁、《書》主知、《樂》主聖、《禮》主義、《易》明大本，是中，《春秋》明達道，是和。」馬一浮先生之六藝關係說可歸為《易》與《春秋》關係說，進而以體——用、神化——人事、大仁——大勇、大本——達道、中——和，或以一德之仁、五德之信、或以實理說之，最後統攝於一心，說來圓融無礙，是綜合歷代諸說的集大成者。

當代熊十力（1884-1968）先生可說是一位新儒家與哲學家。就一位新儒家而言，他必須面對如何看待六藝之學。今從其《讀經示要》、《原儒》、《論六經》諸作歸納其見解。他說：「孔子之道，內聖外王。其說具在《易》、《春秋》二經，餘經（詩經、書經、禮經，樂經即樂記）皆二經之羽翼。《易經》備明內聖之道，而外王賅焉。《春秋》備明外王之道，而內聖賅焉。二經制作極特別，皆義在言外。《易》假象以表意。惟王輔嗣能知之，而俗儒恆不悟也。《春秋》假事以明義，孔子已自言之，而漢宋二派之儒，罕能得其旨。」³⁸「《春秋》與《大易》相表裏，《易》首建乾元，明萬化之原也，而《春秋》以元統天，與《易》同旨。」³⁹「《易》備內聖外王之道，《春秋》特詳外王，而根源在《易》。」⁴⁰「《易》《春秋》、內聖外王之全體大用。」⁴¹他以為二經皆具內聖外王之道，但重點有別，彼此相互表裏⁴²，可以確定熊先生認為二經具有相表—裏的關係。此外，熊先生還認為《易》與《論語》《孟子》《中庸》《春秋》相通，《春秋》與《周官》相表裏，兩《戴記》可與《大易》《春秋》互證，〈禮運〉根本在《大易》《春秋》，《中庸》為演《易》之書等等均表明六經相貫通，而歸本於《大易》，與馬一浮之統攝於一心有別。

³⁸ 熊十力，《讀經示要》卷三（台北：廣文，民56年11月再版），頁142。

³⁹ 熊十力，《讀經示要》卷三，頁146。

⁴⁰ 熊十力，《原儒》上卷（台北：明倫，1971.1），〈原學統〉第二，頁31，總頁第69。

⁴¹ 熊十力，《論六經》（台北：明文，1988.3初版），頁132。

⁴² 二經之關係用「相表裡」表之者有二，見《讀經示要》卷三，頁146，157，用「相為表裡」表之者有一，見同書頁170。

五、關係決定於理解

透過以上的考察，《大易》與《春秋》關係究竟如何？恐怕不是那麼輕易論斷。因為討論二者的關係必須先決定其名確切之所指，若許同名異指則古今渾說，無濟於事。依前第二節所述，知《易》有孔子未序贊之前的筮書之《周易》，和孔子序贊後的筮表理裏之《周易》，或云《易經》、《大易》。《春秋》亦然，有孔子未修前的魯《春秋》，和孔子修作後的《春秋》。如此，討論二者的關係當是從孔子所傳下的《大易》與《春秋》才有意義。可是不幸，漢代尊孔，形成經今古文學二派見解，水火不容。其實，今古文學之爭若僅是古今文字書寫的不同，則其爭殊無謂，問題是觀點的不同才是主要，這就涉及到如何對待孔子所傳《春秋》一書的性質。古文家以為孔子之《春秋》只是修魯史，述而不作，而今文家則以為是作經，立一王法。有以為經是漢以來尊孔著之稱，但古文家不同意，以為經乃古籍，未必專屬孔著，是經之名亦不足以區分孔子前後之《春秋》，此兩漢《春秋》義時見駁雜之故，何況後漢鄭玄混合今古，此義更形淆然。或以孔子亦述亦作，述指早年說，作指晚年說，二義並傳，此不為無理，然今問孔子晚年圓熟之見究竟如何，恐怕不能無所爭議。

據前關係史所論，孔子之前的《易》與《春秋》早成為貴族教育的內容，《周易》作為溝通天人之筮書，或取其《易》象以修德；《春秋》乃魯史，記錄文王周公德業及伯禽以來的事蹟。孔子早年教學當亦順此，在六十八歲返國專心文化事業，刪修六經，尤其贊《易》與作《春秋》，體天合德，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文家欲遙契孔子之心，宋明儒欲體孔子之志者在此。然古文家則以史學家視孔子，納孔子於整個歷史傳統中，只見其一士君子爾，不見其亦為一新聖王也。

故回顧二經之關係史，所見諸論正呈現著三種觀點，由史義、經義至心義之深淺不同層次的論斷。今稍加整理，示圖如下：

項目 觀點	內容		關係		持論者	備註
	《大易》	《春秋》	單向	雙向		
史義	志吾心之陰陽消息	志吾心誠偽邪正			王陽明	六經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天道切人事	人事協天道		○	章學誠	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經義	本隱之顯	推見至隱		○	司馬遷	
	以形而上者說向那 形而下者上	以形而下者說上那 形而上者去		○	朱熹	
	天人性命之消息 以襲準律	公是非之權 以律準襲		○	方以智	互準
	言理 正變、是非之宗	見事 是非、善不善俱存	○		王夫之	《春秋》準《易》
	明天道通人事	紀人事成天道		○	宋翔鳳	
	天道、運用無方 變、內	人事、循守舊職 常、外		○	廖平	相反相成
	本隱之顯 以天道下濟人事 從體起用、全體 神化、大仁、大本、 中	推見至隱 以人事反之天道 攝用歸體、大用 人事、大勇、達道、 和		○	馬一浮	合德、一心
心義	孔子之心	孔子之用		○	孫明復	合德
	聖人之道 如律、如藥方	聖人之用 如斷案、如治法		○	程伊川	合德
	載其理、理、體	見其用、義、用		○	胡宏	合德
	二帝精一執中心 法，百聖所同	撥亂反正，制事之 權，夫子所獨		○	黃楚望	合德
	其大本也，所寓者 天人合一之機	其大用也，所寓者 天人感格之理		○	胡煦	合德
	義理、窮變通久	制度、經世改制	○		康有為	《春秋》以《易》 為歸
	原理、裏	辦法、表		○	呂思勉	合德
	備內聖之道而外王 賅焉 內聖外王 裏	備外王之道而內聖 賅焉 詳外王 表	○	○	熊十力	合德 《大易》為《春秋》 之原

從上表可看出其關係以雙向為大宗，間有單向者，當是屬側重之言。表雙向關係者所運用的思維格式有屬存有範疇者，如：形上／形下，天道／人事，體／用（本／用，道／用，理／用），理／事；有屬認識範疇者，如：內／外，裏／表，隱／顯，常／變，原理／辦法；有屬價值範疇者，如：大本／達道，中／和，理／義，義理／制度，內聖／外王。但不管如何，中國傳統思維對待六經的看法正好是運用以上諸範疇的表現，其表現不管屬存有、認識、價值中的那類範疇，其基本歸向是司馬遷所說的「其合德一」。「德」、「合一」正點出中國哲學思想的基本傾向與基本特徵；因為，「德」是自西周以來就定了調的文化路線，而「合一」正是中國哲學動態有機整體觀所蘊含的圓滿理境。所以，筆者以為不管《大易》與《春秋》的關係會是表列中的那一個，其關係，基本上已由讀者理解的前識——思維範疇所決定了。

六、結論

本文經過以上的論述，已可說明了中華經典詮釋的複雜性。中國傳統文化以經學為本，由儒家所傳承的六藝或六經正是傳統文化的磐石，歷代儒者都在對經典從事創造性的詮釋，那不是抱殘守缺，而是信持皇極（大中）理念的永恆活動。在六經中儒者最看重《大易》與《春秋》了，而其關係先哲向來多所指點，只是語焉不詳。但從以上關係史中，吾人可以發現儒者的詮釋愈來愈詳密，愈來愈靈活。面對著西方詮釋學的興起與介入，許多學者正想從事建立中國詮釋學，但所觀摩的大都是一經的直釋詮釋，而非多經的旁通詮釋，多經的旁通詮釋在中國有相當久遠的傳統，其經驗值得借鏡。從本文的研究中，筆者發現《大易》與《春秋》的關係是如此的複雜，吾人很難保持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立場，如自然科學般地追求一定的關係；在人文學科裏，其結果毋寧是決定於理解的前識，有如此的前識就有如此的結果，而前識又往往潛藏在傳統文化傳承或自己成見中而不自知；因此，哲學便以消除自蔽，恢復心靈之自主為功，它成為人文學科發展的基本動力。

按：本文初稿係筆者參加私立東海大學哲學系主辦的第二次「哲學與中西文化：反省與創新」學術研討會（2002年6月）之論文，今年五月十日有緣應邀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針對此題目作專題演講，並與與會諸君討論，現將講稿再加修訂，投《經學研究集刊》，以廣流傳。2007.6.24 記。